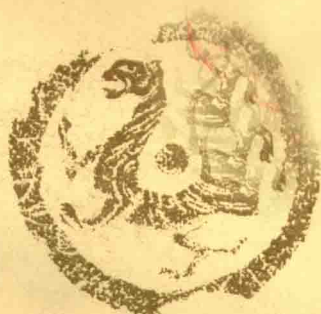


史學情況選編

1979 — 1981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史學情況選編

史学情况选编

(1979—198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大32开本 2.5印张 85,000字

印数: 1—2,500 1982年印刷

GDI 94/03

说 明

本所恢复以后,自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起,刊行了不定期的油印内部刊物《史学情况》,供与外单位学术交流之用,现已出刊 21 期。

《史学情况》自第 8 期起基本内容是反映本所的学术活动和本所接待外宾进行学术交流的情况。

值此复所三年之际,本所正在总结经验、汇集成果、举行展览。为此,特选刊《史学情况》中一部分文章,编印成册。

这里并不能反映我所学术工作的全貌,但可显示其一个侧面,以供关心本所工作的同志参考。

编者 1981.11.10

目 录

认真学习《决议》，坚定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1)
端正学风，搞好史学研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历史所举行大型座谈会畅谈体会·····	(3)
历史所讨论聂荣臻同志一封信的情况·····	(8)
方诗铭谈史学研究工作·····	(11)
历史所举行学术汇报会，汤志钧畅谈工作与体会·····	(13)
当之无愧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悼念刘少奇同志·····	(18)
工运见卓识，奇冤今大白 ——历史所集会介绍刘少奇同志城市群众工作方面的 丰功伟绩·····	(23)
从黄桥战役看陈毅同志的军事思想 ——记黄逸峰同志在历史所的一次讲学·····	(28)
缅怀先烈，推动党史研究工作 历史所举行茅丽瑛事迹报告会·····	(35)
党史研究面面观 ——记现代史室的座谈会·····	(38)
访问随笔·····	(41)
五十年代上海工运史料工作回顾 ——喜见《上海史研究通讯》创刊而作·····	(45)

掌握资料,开展上海专业史的研究	
——记本市部分业务部门上海史研究工作的	
一次座谈会·····	(52)
吴乾兑综谈辛亥革命讨论会·····	(56)
北京师大政教系副教授张静如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	
评价问题·····	(61)
寻根究底挖史料,实事求是评人物	
——唐振常谈吴虞研究·····	(66)
关于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探讨	
——记丁日初同志在历史所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72)
绿叶相扶	
——谢圣智、刘渭先文章读后·····	(79)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现实意义	
——记侯方岳同志到历史研究所的一次讲学·····	(82)
邓广铭教授来上海历史所讲学记·····	(88)
万木春	
——记宋史研究会的成立·····	(93)
孜孜于一个历史侧面的研究	
——谢国桢教授谈治学体会·····	(96)
谢国桢近著《略论明代农民起义》一文简介·····	(100)
江文汉先生在全所大会上谈基督教史的研究·····	(103)
美日史坛一瞥	
——章开沅来所谈出访观感·····	(107)

认真学习《决议》

坚定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回顾我党历史，在一次大转折关头，必有一次深入的学习运动，以统一全党的认识，端正前进的方向。党的创立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气是浓厚的，至今留下不少经典著作的早年译本（《共产党宣言》就有 1920 年的全译本），当年许多革命者都奉为圭臬。缺点是学习跟中国国情结合不够，这是后来教条主义盛行的原因之一，在关键问题上容易受外国人的指使。

八七会议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在危急的关头结束了党内的投降主义，举行了武装的抵抗。然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没有能够继之以一次学习运动。三十年代在上海是译过不少马列著作，因为跟实践脱节，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样，貌似理论甚高的王明之流登台，全党就受其迷惑，流毒甚久。

遵义会议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从此建立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权威。其后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延续达四年之久，统一了全党

的思想，提高了全党的水平，做出了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特点是摒弃左倾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从此中国革命一马当先，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向前发展，直到全国解放。

七届二中全会是又一次转折，提出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面向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次转折之后，随着军事上迅速平定大陆，理论上学习建国大计，则一直持续到1956年，靠了全党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经过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吹起新的进军号！在我党诞辰六十周年的节日，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了。面对这一次新的伟大转折，我们必须精读文件，切实领会《决议》的结论。这次的学习重在清理思想上多年来的左倾流毒，明辨三十二年来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还应当学习贯串在《决议》中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拿来对照我们的工作，达到实事求是，改进学风的目的，以便涌现成果和人才，为四个现代化的辉煌事业作出贡献！

（聆 耳）

载《史学情况》第21期

端正学风 搞好史学研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历史所举行大型座谈会畅谈体会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本所举行纪念建党六十周年大型座谈会，全所同志都参加，副所长沈以行主持。他回顾了本所上半年完成科研任务的情况，号召全所同志以搞好科研工作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建党六十周年。前一段时期，各研究室学习讨论了聂荣臻同志给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一封信，感到很有启发。在这次会上，就有六位同志联系该信精神畅谈体会，表示进一步搞好科研工作的决心。

必须重视资料工作

处理好搞资料和写文章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室刘运承说：出资料书是我们历史所任务之一，我们不能轻视资料工作。一本高质量资料书倒可能是“传世之

作”。也只有大量搜集资料才能写出象样的研究著作。现代史一室李飞,从1979年以来一直在参加“八一三”抗战史料的汇编工作,在会上,她谈了对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关系的认识。她说,开始时对搞资料工作很轻视,认为抄抄写写,没啥学问。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体会到资料工作既艰苦又重要。没有资料,写不出文章。抄抄写写,要动脑筋,以便分析比较,去伪存真。例如,有关“八一三”抗战的资料,从当时的报上看,有关总工会和抗敌后援会活动的报导不少,似乎救亡活动是他们在搞,但访问了老同志后,就知道那是国民党控制的组织,不过是个空架子。大量的救亡活动是党所领导的各界救亡协会搞的。对于长期积累及短期任务的关系,她认为,有了长期积累的资料,短期突击写文章才有把握。如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传,需要写“谢晋元传”,由于我们原来就访问过谢晋元的家属,看到过他们保存的许多资料,所以接受任务后很快就能写出来,编进了人物传。

必须重视规划项目 处理好个人写作和集体项目的关系

近代史室徐元基说,要搞好科研,必须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聂荣臻同志的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也指出了当前科技干部晋升职级中的一些偏差,就是片面强调有何著作,而不着重于考察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实在在的贡献。看来,这种偏差在我院也是存在的。去年我院评定职称,似乎眼睛只看着著作、

论文。这样做，不符合我院文革前多年实际情况。那时领导上再三强调集体大项目，强调编资料，而不鼓励个人写作。而我院去年评职则走到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个人论文、著作，其结果可能导致大家无意于编资料，搞集体项目，只重视个人写作，从而使规定的重要科研项目有所削弱。所以正确处理好资料与论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必须明确写文章的目的性 不应标新立异而背离马克思主义

现代史二室金立人认为研究历史写文章的目的有三点：

一、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我国古代研究历史就有很明确的目的，《资治通鉴》的书名就写得明白白：为政治服务。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研究历史，不能“与治无鉴”。

二、针对实际，有的放矢。近年来倡导思想解放，现在需要继续提倡。科学需要有新的突破，但要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不是随心所欲。那种想当然的随心所欲的，以至把陈腐的观点冒充新意的，等等现象，都需要加以澄清。

三、普及历史知识。

搞科研是严肃的事，成果要看问题大小，成熟程度。达尔文考察了一生，晚年才写出《物种起源》的论著。总之，搞历史目的明确，本着对社会主义祖国负责，对党对人民负责，自会成果累累，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刘运承认为当前写文章中有些不好的倾向：一是一味求新，以至标新立异，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的其实对所写的内容并无研究，似懂非懂，却东抄西抄，拼凑成文；有的是只看“行情”，根据“需要”，抓住三言二语就批人家，好象发展马克思主义很容易似的。例如，有人批毛泽东同志的《愚公移山》，这就很不严肃。也有的对“实践——认识——实践”，以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观点也加以否定，进行所谓的批判。奇怪的是这类文章在某些刊物上倒很容易刊登，似乎只要是与传统观点不同的就是好，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偏向。二是为发表而写文章，不注意社会效果，不考虑到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对革命负责，对社会主义祖国负责。那些只管揭露阴暗面，对四化丧失信心的文章，对社会是不利的，应该予以纠正。

上海史研究室邬烈勋介绍了成立上海史、志研究会（已在本所大门口挂牌）的情况。

最后，本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方诗铭发言，指出当前研究中国历史有些值得注意的动态：有人吹捧国外学者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来攻击中国革命的一些论著；有人拼凑一些观点写文章论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把中国社会写成一片黑暗，一向落后，认为中国农民战争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如果这些观点成立，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就需要重写。综其观点推论，旨在说明中国今天处处不如西方，拜倒在外国人脚下。还有人大谈其所谓中国工人阶级的先天不足性，也是说中国不如外国，外国有世世代代的血统

工人,我们只有世代代的农民意识云云。诸如此类,我们也不能坐视,要写文章与之商榷。年轻人立论欠妥,可以谅解;编辑者标新立异,实是一种不良倾向。

(王 鲁)

载《史学情况》第 21 期

喜读小刀会文章

惜 言

我所旧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现已再版发排。在这时刻,读到方诗铭、刘修明两位同志的文章《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历史学季刊 79 年第三期),颇觉可喜。文章分析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小刀会这支队伍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其中秘密结社的渊源又如何?都经过发掘史料来一一加以说明,而不同于象过去有些文章那样以歌颂小刀会英勇作战为唯一职志,这是研究工作深入一步的表现。看来我所近、现代史的若干专题,似可取法,以资借鉴。故乐为介绍如上。

载《史学情况》第 10 期

历史所讨论聂荣臻同志 一封信的情况

最近，本所各研究室对聂荣臻同志关于“不应片面强调以有何著作作为晋级依据”的一封信，普遍进行了一次讨论。聂荣臻同志说：“晋升条件还是要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的考核标准。讲才也首先看他的本职业务水平”。大家觉得很有启发。尽管信中主要是针对科技干部讲的，但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适用的。讨论中，同志们认为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必须处理好写文章与搞资料的关系；个人写文章与集体项目的关系；写配合形势的文章与长远项目的关系；研究工作与图书工作、管理工作的关系。

关于写文章与搞资料的关系。一些同志谈到理论工作者离不开一张嘴一支笔一个头脑。写文章是我们职责所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文章（包括著作，著作就是篇幅很长的文章）。但写

文章要讲究质量。好文章总是有丰富的资料作基础。可以说，“资料是十月怀胎，文章是一朝分娩”。那种不愿搞资料、重文章轻资料、或别人搞资料自己写文章的做法都是不对的。至于本所过去曾经有过不问具体情况，把写文章一概批为“个人名利”、“白专道路”的“左”的做法，也应防止其重现。但是现在要提倡重视资料，要在资料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出好文章。在考核、晋级时，既看文章，又对搞资料工作的成绩充分予以考虑。

关于个人写文章与集体项目的关系。许多同志说，当前需要着重注意的是搞好科研规划内的集体项目。现在有些重点项目进展不快。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规划内的项目上。在此前提下，也不排除那些学有专长的同志对他有所研究的问题写些文章，但不能因此而置规划内项目于不顾。正如聂荣臻同志说：“一个科技干部不解决本职范围内的问题，一味搞自己的论文，也应批评教育。”

在谈到个人写文章时，有些同志提出如何对待配合当前形势的文章？讨论中认为类似纪念党的诞生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等大型活动，作为历史所，写文章是责无旁贷；有时根据形势需要，也可做些普及性的宣传工作。但是写文章、做报告应该是自己确有研究，或者与探讨本专业有关的，而不提倡做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的文博士。有些同志兴趣面较广，这也可以，但研究面不能广，写作面尤其要选择。今后评职升级应注意考核研究人员的学风及其对集体项目的基本态度。

关于研究工作和管理工作、图书工作的关系。同志们认为后者要为前者服务，但过去对科研管理工作重视不够，评职升级

考虑管理工作的特点也不够,所以研究人员不愿去搞管理工作。某些管理措施与研究工作的不相适应,突出的是院部规定的成果统计,光看文章数量,不计其他方面,这种统计有很大的片面性。讨论中,有的称之为“研究工作简单化”或“研究机构工厂化。”此外,好几个室提到图书工作与研究工作的关系很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图书工作人员的考核和晋级应该看其是否熟悉图书业务,能否搞好本职工作为科研工作服务为依据,而不以另写与本职无关的文章为依据。过去偏重于写出文章为依据,恰恰助长了图书工作者不安心于其本职。

(学术秘书组) 1981.6.30

载《史学情况》第21期



方诗铭谈史学研究工作

最近，历史所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时，开了一次大组学习交流会，古史研究室主任方诗铭同志作了《历史科学研究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发言。要点如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遵循的。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四个现代化。历史科学研究，首先存在一个本身现代化的问题。在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长期闭关自守，林彪、“四人帮”又大搞影射史学，一些正确的口号，如“古为今用”、“理论联系实际”等，也被他们歪曲篡改得不象样子。历史已经不成其为科学，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现在，放眼看世界，从史料到史学，都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让我们北京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心。国外研究的问题，我们要研究；国外没有研究的问题，我们更要研究。不但对中国历